

少年
中国

人文阅读书系

儿歌

张学昕 / 丛书主编
叶兆言 /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 张学昕

八 歌

叶兆言 /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 连 ·

© 叶兆言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儿歌:彩插版/叶兆言著. —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0

(少年中国·人文阅读书系)

ISBN 978-7-5652-2763-9

I. ①儿… II. ①叶…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275 号

出 版 人: 王 星

策 划: 王 星

责任编辑: 齐树友 都珍珍

责任校对: 王盼盼

装帧设计: 李小曼

插图绘制: 杨雅楠

ERGE

儿 歌

出 版 者: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网 址: <http://www.lnnup.net>

<http://www.press.lnnu.edu.cn>

邮 编: 116029

营销电话: (0411) 82159126 82159915 82159912 (教材)

印 刷 者: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5

插 页: 12

字 数: 103 千字

出版时间: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2-2763-9

定 价: 22.00 元



那幢十三层的大楼成了小纳一个人的秘密。他常偷偷爬上楼顶，独自一人向菜场方向瞭望。

——《儿歌》



在十一岁的老木心里，那片巨大的墓地，象征着荒凉，象征着绝望，象征着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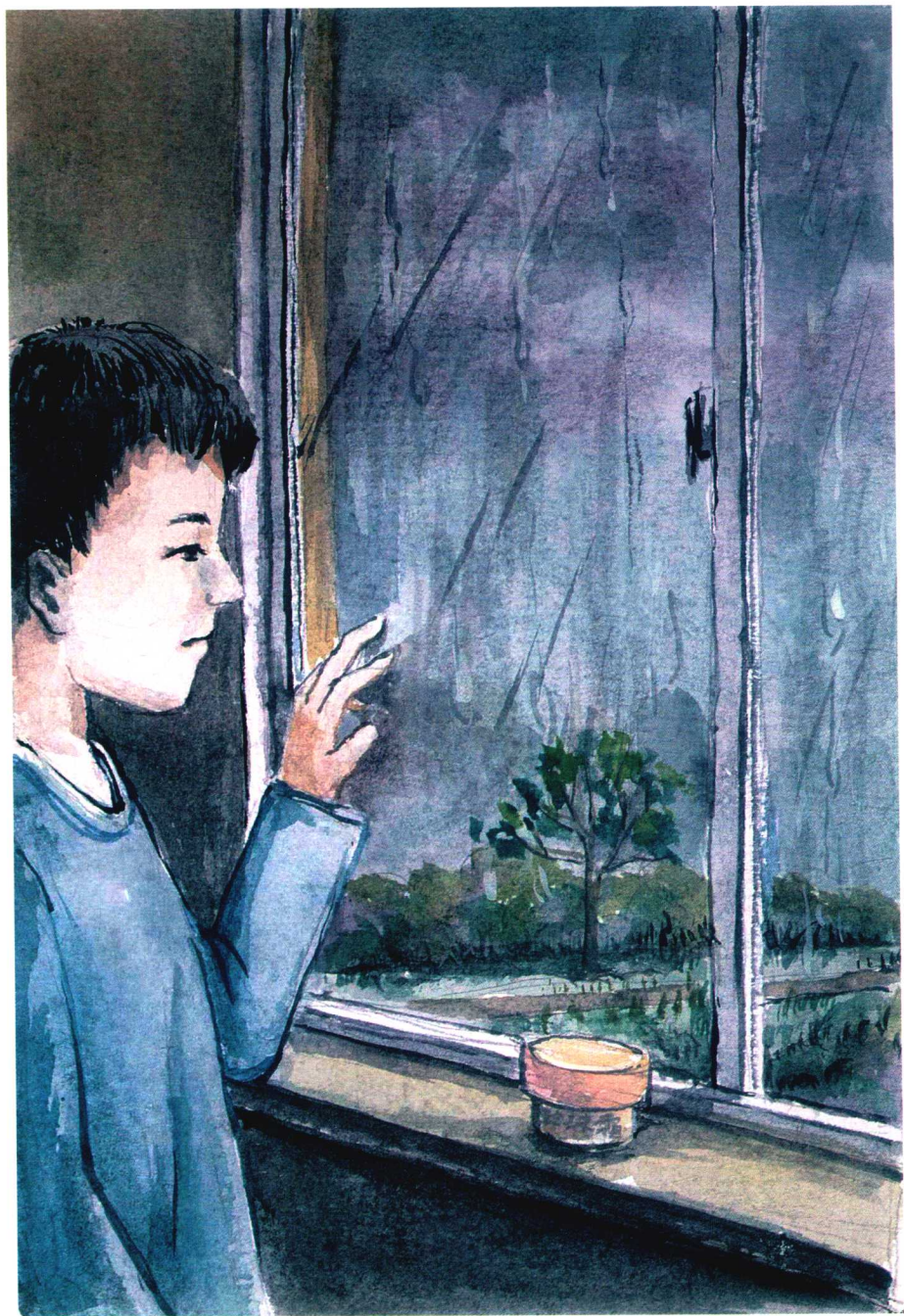
——《十一岁的墓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窗前有竹可喜可贺，我喜欢笋柱往上蹿的
倔劲，更喜欢新竹翠绿。

——《窗前一丛竹》



窗外，雨中的人工小花园呈现出一派柔和的灰色，生机盎然，那棵由两个小孩新种下的小树，大雨中孤零零地站在那儿，非常倔强。

——《雨中花园》



当时间流逝以后，我们将发现自己永远顾此失彼，
我们得到什么的时刻恰恰意味着同时正失去了什么。

——《把钟拨快些》

总序

王德威

王德威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

一九〇〇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力倡少年为国家新生之本。相对于“老大帝国”，“少年中国”凭其青春朝气，不仅振衰起敝，更投射出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愿景。“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本人率先将“哀时客”之名改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一时如应斯响，各种以少年为名的声音——从“铁血少年”到“突飞少年”——此起彼落，成为庚子以后的中国文坛学界之莫大契机。

即使一个世纪以后，梁启超及其同代人倡议“少年中国”的热情仍然让我们深深感动。“少年”一词古已有之，却是在二十世纪初被赋予了前所未见的丰富含义。“少年”拥有承先启后、迎头赶上的情操；而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少年”也袭取了物种进化、日新又新的寓意。青春与文明、身体与国体形成了有机对话关系。

从文学角度来看，“少年中国”也是我们想象现代、叙述中国最重要的修辞策略之一。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亲撰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写青年志士投身革命、再造中华的壮举。在此之前，梁启超已翻译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并发表于《新民丛报》。一九〇五年，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吴沃尧开始写作《新石头记》，署名“老少年”。《新石头记》以《石头记》为蓝本，叙述贾宝玉的现代历险，老少年为其中关键人物。吴沃尧与梁启超对少年的构思因此形成微妙对话。梁的“少年”富有无限青春动力与希望，吴的“老少年”却让我们反思究竟是少年老成，还是未老先衰。无论如何，这样的对话为五四以后的少年辩证论述预为伏笔。

由“少年”所召唤出的青春想象在民国时期有增无减，并扩大为“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等创办《青

年杂志》。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以“初春”“朝日”比喻青年的朝气蓬勃，期勉中国新生代奋力创造未来。次年，李大钊继之以《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宣称“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青春》）。

而五四期间奉“少年”之名而起的活动，首推“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于一九一八年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创立，学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后得到各方响应，分会甚至发展到国外。胡适曾以《少年中国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李大钊、王光祈、恽代英等也先后就“少年中国”的内涵各抒己见。时值五四运动狂飙卷起，“少年中国”成为不同路线和立场，不同方法和对话的交锋所在。面对国是，有志青年应该投身运动还是勤工俭学，追求革命救亡还是启蒙淑世，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

五四文学对少年——以及延伸而出的青年与童年——的思考和描写，是彼时作家和读者共同的焦点，而其风格复杂幽微处远远超过当时流行的论述。鲁迅作品其实

饱含自己成长期间的悲哀与犹疑——《父亲的病》写尽人子面对父系传统的暧昧情怀，《在酒楼上》则暴露两位“老少年”回顾五四的虚空与怅惘。郁达夫白描青春欲望的域外“沉沦”；郭沫若翻译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成为中国少年的烦恼；蒋光慈则以《少年漂泊者》号召革命与浪漫的先锋到来。

一九二七年后，叙事文学形成复杂的少年与青年论述。叶圣陶的《倪焕之》记叙同名主人公的成长与冒险。启蒙还是教育，恋爱还是婚姻，革命还是家庭，种种考验此起彼落，让曾充满抱负的少年一蹶不振，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倪焕之》娓娓叙述了一个青春不再、理想幻灭的故事，不啻为彼时混沌不明的历史环境写下预言。而小说所沿用的叙述方法又恰恰与西方“教育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形成对话。后者着眼少年成长、进入社会、完成教育，叶圣陶却反写此一模式，以初始长成的少年开始，以含恨早逝的“老少年”告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教育小说”形式出现的小说风靡一时，叙述以主人公不加入社会，反而加入社会对立面的革命为高潮。茅盾的《虹》由五四时期四川一位女学生梅行素的启蒙教育开始，一路描写她所经历的爱情、事业挫折，以及对革命的向往与犹疑。茅盾书写女

性情怀一向拿手，此作可见一斑。小说高潮，五卅罢工游行中，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学生已经站在上海租界街头摇旗呐喊搞革命了。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及其他著作才真正带出三十年代“少年中国”的要义。《家》中的高觉慧也出身四川世家，亲历传统礼教的虚伪与败坏，以及无数青春生命的牺牲。高觉慧的激情与郁愤、呐喊与彷徨曾经引起多少同辈读者的共鸣，而当他决心冲破网罗、承担改造中国的艰难使命时，又曾经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时刻！

与此同时，沈从文写出迥然不同的故事。沈从文来自湘西，他笔下的少男少女长在青山绿水的苗寨之间，远离革命启蒙喧嚣，另有一番风情。但他们毕竟要接受成长的洗礼、爱欲的磨炼和死亡的威胁。于是有了萧萧、三三、天天的痴迷和怅惘，或贵生、虎雏、龙朱的向往与绝望。我们不曾忘记《静》里女孩岳珉在乱世独立危楼一角，怅望未来的孤单身影；《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那个身陷情网的小兵，见证爱与死的恐怖心情。而《边城》中情窦初开的翠翠如此清纯却遭受命运拨弄，成就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写自己的成长小史，从边城到古都，从少年军人到五四文青，早已是启蒙文学经典。

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乱依旧，书写青春的文学因此形成更为独特的论述。在大后方，一方面有鹿桥的《未央歌》写出西南联大学生烽火中的真情岁月；另一方面有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写出流亡跋涉途中的儿女悲欢。两位作者都以早慧知名，而他们的作品也不啻是自身告别少年岁月的写照。此时，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伪满洲国的梅娘也各自以其细腻世故的笔锋，写出少女成长的代价。张爱玲《烬余录》见证死亡的虚无、《第一炉香》刻画情欲的凶险，还有梅娘《蟹》探讨家庭关系的变奏，都是乱世的异质书写。相对于此，解放区的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袁静、孔厥以《新儿女英雄传》这类作品突出了革命战争中的青春愿景，一心一德，反显得无比可爱天真。

在台湾，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被殖民统治的青年颓废沉郁，仿佛有无限难言之隐。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即自书名已经道尽一代台湾作家的心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发现的旅日少女作家陈蕙贞《漂浪的小羊》，记叙日本战败后十四岁的作者随父母几经辗转、逡返大陆定居的过程，除平实记叙少女情怀外，亦极富史料价值。在香港，黄谷柳的《虾球传》则以孤儿虾球从社会底层力争上游、

加入革命的故事，投射当时流亡文人的政治想象。沙平（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幻想海外少年弃笔从戎、遨游祖国，既有天马行空的科幻奇想，也有呼应时局的政治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书写充满破旧立新的激情，仿佛“少年中国”的梦想一旦实现，人人必得极尽呵护之能事。但因此形成的颂歌或批判，浪漫或写实的拉锯，反而导致惊心动魄的纠葛。这期间直接呼唤青春的重要作品一为王蒙的《青春万岁》，一为杨沫的《青春之歌》。前者白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群高中女生的情感与意识形态洗礼，并以这群学生偶遇国家主席为最高潮。后者叙述一位少女历经感情与革命教育成长为革命女性的遭遇，无异延续茅盾《虹》、巴金“激流三部曲”的传统。王蒙写作《青春万岁》时不足二十岁，本人就是青春的化身，而杨沫曾亲历一二·九运动，并以此背景现身说法，回想一代青年投入革命的因缘。但两部作品命运截然不同。《青春之歌》历经修改，出版后一纸风行；《青春万岁》却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方才问世，而其间作家本人所经的沧桑更“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是青春挂帅的作品，孙犁的《铁木前传》却往往被忽略。此作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以两小无猜的人物为主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北方农村作出生动刻画，

极具艺术特色。

“少年中国”的历史、政治实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高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青年学生，直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谆谆期许之意，不啻回应梁启超在世纪之初的宣言：“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跨海过去，我们可以感受台湾六七十年代的青春书写。白先勇早期有《寂寞的十七岁》，写少年男女成长的虚无与对情爱的模糊渴望。女作家李昂的成名作《花季》也写的是寂寞的十七岁故事：女高中生因为逃课而堕入一场似真似幻的冒险，因此一夕长大。李昂写作《花季》时的确只有十七岁，初试身手之作到今天依然触动人心。七十年代，王文兴以《家变》震惊台湾文坛。此作反写教育成长小说公式，描写一个少年长大成人后认识到父亲的平庸与无能，最后老父不堪羞辱，被迫离家出走的故事。从巴金的《家》到王文兴的《家变》，现代中国父子关系至此彻底翻转。《家变》惊世骇俗，曾让卫道之士群起而攻之。但论七十年代最为风行的青春写作，

当属朱天心的《击壤歌》，此作写青春少女的如歌岁月，情真意切。而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在胡兰成指导下，和同伴组织《三三集刊》，颂赞中华，应是二十世纪台湾最后的“少年中国”呼声。

在上述的背景下，当代青春叙述次第展开。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便是众多作品的选样。他们历经身心的锻炼，笔下纪实有了感伤与郁愤，更不乏遐想与激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城的“三王”系列，写下乡知青的传奇遭遇，写化外村野的有情天地，如此扣人心弦，一时传颂海内外。另一方面，老鬼作为杨沫之子，显然借《青春之歌》为对话对象，铭刻另一世代的青春之歌。苍山如海，黄昏如血，少年子弟江湖老，笔法又何其跌宕苍茫。

也正在此时，老作家汪曾祺的回归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汪曾祺四十年代开始创作，此刻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重新将抒情风格导入写实传统。他写小和尚的浪漫追求，小锡匠的江湖情怀，急切抽离历史政治元素，充满民间气息，却绝不流于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崛起的寻根、先锋作家多有名作重新铭刻“少年中国”的前世今生。苏童的“城南故事”系列、